

敦煌藏经洞之沙州都督府文献

谢 桃 坊

自公元 1900 年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四万余件古代写本文书之后，中国和西方的学者都努力探索这神秘的文化遗存，试图解开藏经洞之谜。关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和原因，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推测基本上为学术界所认同。关于这些文书是谁藏的，虽然也有学者作过几种假说，却往往为其表面现象所迷惑。我以为它应是沙州都督府文献。

—

中国三国时魏文帝开始设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太守），而都督中外诸军及大都督的权位最重。东吴和蜀汉仿照魏而设置。晋和南北朝亦沿袭此制。唐代建都督府，分上中下三等，上都督由皇室亲王担任，但属赠官而无实权。唐代边防重镇的都督则加旌节，称为节度使。中唐以后节度使增加，都督之名遂废除。河西走廊自西汉设郡以来，于敦煌派刺史负责军政事务，而在凉州设刺史部以负责河西四郡之军政。唐代凉州设中都督亦负责河西军政，其余河西各州均为下都督。中都督即节度使，下都督即刺史。沙州自汉代建郡后即有郡署，以后改为州府，唐代为都督府，乃州行政机构所在。今存敦煌文书即有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三

种，它们是沙州都督府辖区的地志。安史之乱后，凉州为吐蕃占领，河西节度使移镇沙州；这样沙州升为中都督，由节度使负责河西军政事务。大中五年（851）唐王朝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继续负责河西诸州军政。所以沙州的郡署、州府到都督府都是相沿的地方政府所在地。沙州都督府保存了公元五世纪初年以来至十世纪末的地方政府档案资料、儒家典籍、史书地志、文学作品、通俗读物、民间契约和宗教经卷。

唐代以前的沙州郡署官方文书经过隋末战乱已大量被毁，今仅存《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S0113）和《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瓜州效谷郡计帐》（S0613）两种。唐代沙州都督府文书则保存很多，如武则天至唐代宗时期的籍帐有十二种，差科簿两种，财政文书十四种^①。它们是沙州政府辖区内关于户籍、授田、差科、赋税、仓库物资的档案，表明政府在民政管理方面所行使的职权。关于沙州都督府的重要政治文书，例如《河西巡抚使判牒集》（P2942）、《张义潮收复凉州进表》（S6342）、《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S1156）、《归义军上都进奏院贺正使押衙阴信均状》（P3547）、《曹元忠献硃砂状》（S3498）、《归义军支出酒帐》（P2629）、《曹延禄上表》（P3827）、《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P3863）、《曹义金上回鹘宰相书》（P2992）、《归义军公文集》（P2945）。在《敕归义军节度使牒》（S4291）署有“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曹元忠”，《归义军敕令》（P2136）署有“敕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七百户敦煌郡王曹”；这是曹氏任归义军节度使时发布的公文。我们还见到一些钤有沙州都督府署印的籍帐和公文，如《唐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有“沙州都督之印”和“敦煌县之印”一百余颗（S0514），《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效谷乡里籍》缝上有“敦煌郡之印”（S4583），《戊辰年

十月八日就东园算会小印子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铃有“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P2484),《唐天宝(750)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有“敦煌县之印”数颗(P2803),《显德五年(958)阴保山等牒》铃有“瓜沙等州观察使新印”(P3379),《上都进奏院状》铃有“沙州院”之朱记方印(P3547)。沙州都督府的官员及州学博士、学士等,他们为本地撰制的著作或抄录的经典俱署官职,保存于府署文献库之内,例如《书仪》的编著者署名“唐河西节度使掌书记张敖”(P2556),《论语集解》卷端署“大唐乾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敦煌县归义军学士张喜进书记之也”(P2681),《显德三年丙辰岁具注日历》署“学仕郎守州学博士翟奉达纂”(S0095),《瓜沙两郡大事记》署“节度孔目官兼御史中丞杨洞芊上”(P3721),《晋天福十年(945)寿昌县地境》署“州学博士翟(奉达)上寿昌张县令地境一本”。以上文书有的是进呈中原王朝表状复件,有的是政府处理行政和财政事务的档案,有的是正式下行的公文,有的是府署保存的地方文献。

在沙州都督府文献里保存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外交文件和军事情报,例如西域于阗王致河西节度使张淮深的信札,其中铃有“通天万寿之印”和“大于阗汉天子制印”,商谈河西与于阗的政治军事关系(P2815);《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是张承奉金山国时期以沙州百姓的名义给甘州回鹘的书信(P3633);张淮深时期肃州防戍官员给归义军的军事报告,叙述中和四年(884)回鹘军与龙家、吐蕃在甘州的争夺战争情况(S0389);凉州节度使押衙刘少晏报告甘州回鹘劫掠凉州的情况(S5139)。在沙州都督府文献里有一件《王留子状》:

常乐押衙王留子。伏以留子,前遣留子放牧牛羊,自不谨慎,只欠羖羊□□拾伍头。今阿郎开大造之门,应有诸家债欠并悉赦免。只有留子今被宅官逼逐,不放存活。伏乞司空台鉴,赐留子全家得以存活。(S4459)

常乐为瓜州属县，司空为张义潮^②。此状是常乐县押衙王留子因曾被派遣放牧牛羊，遗失羖羊若干头而受到追索。时遇沙州赦免欠债，王留子特请求沙州节度使张义潮准予在赦免之列，以让他全家得以存活。张义潮怎样处置此事的情况不得而知，但状子却留在都督府档案里了。还有一件敦煌新乡民众《谢司徒娘子施麦恩德疏》：

右汉子、佛德、百姓等，自从把城，苦无丝毫之劳。今司徒娘子重福，念见边城，恰似正二月，布施百姓麦五车，一一打与贫乏百姓，救难之接贫命饥荒种子。汉子、佛德、百姓、老小女人，参拜司徒娘子恩德福因，应四遭番人专名，无任感恩悚惧之至。今者汉子、佛德于何都头手上领得雍归麦替麦拾伍车，又□都衙先欠麦九车十三石五斗，并无升合不欠。谨另陈谢。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

至道元年正月新乡副使王汉子、尉迟佛德（押）牒。
(S0374)。

这是宋太宗至道元年（995）新乡副使王汉子和尉迟佛德代表新乡百姓感谢节度使守瓜州团练使检校司徒曹延瑞夫人施舍粮食以救饥荒的牒文。此牒也留在都督府档案里了。

以上各类文字皆可说明它们不可能是民间私家的文献，它们是沙州都督府的文献档案，是敦煌这远离中原王朝的汉族政权实行职能的历史遗物，表明中国边陲汉族政权存在的事实。

二

沙州都督府文献究竟存留多少件，迄今尚无准确统计和专项著录；此外民间契约、经史典籍、文学作品、题记杂文等项，迄今亦无准确统计和专项著录。这使我们感到全面深入地研究敦煌文化非常困难。目前敦煌文书约存四万五千余件，其中俄罗斯所藏近两万卷仅有极少部分有编目。虽然它们绝大多数是佛经，但

经卷的背面或后面常混杂有政府公文和非宗教性的文字，还有许多独立的政府公文和社会经济文化史料，因此试作最保守的估计：敦煌文书中非宗教性的卷子将在五千件以上。这绝对数目是不小的，然而当我们认为敦煌文书是沙州都督府文献时，又如何解释它竟有将近百分之九十的佛教经卷呢？这种现象真是很奇特的。敦煌文化是永远与佛教文化纠结一起的。

唐代天宝元年（742）沙州曾改称晋昌郡。莫高窟 D130 为僧处谚等所造，乐庭环夫妇父子所供养，内有大佛一尊，高二十余公尺。窟的北壁供养人像第一身乌帽青袍束带者，题云：“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乐庭环供养”。乐庭环守晋昌郡（沙州）兼墨离军使在天宝时期，所开窟寺当在天宝十四年（755）以前。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两京收复后，晋昌郡遂废。这是沙州太守第一个开窟的。因敦煌这个地方长期以来盛行佛教文化，行政长官无不受到感染。后来沙州与整个河西从吐蕃统治下得以收复，佛教僧侣曾起过重要的号召作用，所以归义军执政者形成了崇奉佛教的传统。张义潮开的窟寺有 D156 窟，张义潭开的有 D95 窟，张淮深妻开有 D38 窟，索勋开有 D196 窟，曹义金开有 D401 窟、D275 窟，曹元德重修 D482 窟，曹元忠开有榆林第 12、26、22、17 诸窟、D437 窟，曹元忠夫人翟氏为宕泉窟布施，曹延恭开有 D454、444 窟。归义军这远离中原王朝的汉族政权能在西北复杂的战乱环境里孤立地存在一百五十余年，其中获得广大佛教徒的支持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归义军政权与佛教互相倚重，基本上是难以分开的。根据敦煌行政长官和归义军执政者崇奉佛教的情况，我们将不会对在沙州都督府文献里有大量的佛经卷子感到惊奇。我们如果从佛经卷子题记留下的线索进行分析，可知其来源大约有三种：

（一）沙州刺史、归义军河西节度使、沙州军政官员及家属，因宗教信仰支配，努力宏扬佛法，广积功德，遂写造佛经。北魏

时沙州改为瓜州，宗室东阳王元荣于公元六世纪之初任瓜州（沙州）刺史。他是极信奉佛教的，造写了大量佛经^③。

《大般涅槃经》(P2117、2205)题“大业四年(608)四月十五日敦煌郡大黄府旅帅王海，奉为亡妣敬造《涅槃》、《法华》、《方广》各一部，以兹胜善，奉福为灵。仰愿超越三途，登临七净；世世生生，还为眷属。六道含识，皆沾愿海。”这是隋代敦煌郡将领为其亡母所造的佛经。《观世音经》(S4397)题记：“广明元年(880)四月十六日天平军凉州第五般防戍都右厢厢兵马使梁矩，缘身戍深蕃，发愿写此经。”这是唐僖宗时河西将领远戍吐蕃求菩萨保佑而造的经卷。《金刚经》雕版印刷本(P4515)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组织刊行的。题记云：“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949)己酉岁五月十五日记。雕版押衙雷延美。”日本桔瑞超藏《佛说延寿命经》是曹元忠夫妇为幼子夭折而造的，题记云：“维大周广顺三年(953)岁当癸丑正月二十三日，府主太保及夫人，为亡男太子早别王宫，并辞火宅，遂写《延寿命经》四十三卷以济福力。愿超觉路，永充供养。”这些经卷为沙州都督府官员或将领所造，留在府署文献库里。

(二)佛教僧侣们为了给地方府主以善良祝愿，或将所造的经卷呈送都督府。《瑜珈师地论》(日本桔瑞超藏)卷二十三署：“大中十年(856)十一月二十四日苾刍恒安随听抄记。”这是唐宣宗时佛弟子抄的。“苾刍”为梵语，意为佛弟子。僧人恒安将此经卷呈送与归义军节度使，故钤有“瓜沙州大王之印”，为府署所藏。《佛说佛名经》(羽24)第三卷跋云：“敬写《大佛名经》二百八十八卷。伏愿城隍安泰，百姓康宁；府主尚书曹公己躬永寿，继绍长年，合宅常然庆吉。于时大梁贞明六年(920)岁次庚辰五月十五日写记。”这是五代时曹义金已经实际上主持沙州政权，某僧人写经为府主祈福而呈上的。《藏内经论现存目录》(敦煌任子宜藏)著录敦煌莫高窟三界寺经目，由释道真所编，著录佛经一百

四十八部。道真发愿文云：“长兴五年（934）岁次甲午六月十六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不全，遂乃启颙虔诚，誓发宏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城隍泰乐，社稷延昌。府主大王常臻宝位。先亡姻眷，超腾会遇于龙花；见在宗枝，宠祐常霑于采族。应有藏内经论，见为目录。”文中称曹义金为府主大王，特呈上此录。《佛说楞伽经禅门悉谈章》（P2204）卷末题：“天福六年（941）辛丑岁十二月十九日净土寺比丘僧愿宗题。迷头尚小，自后再堪，知敦煌县公索。”此经是后晋时莫高窟净土寺僧愿宗呈致敦煌县令索氏的。《维摩诘所说经》（冬62）题云：“大周广顺八年（958）七月十一日西川善兴大寺西院法祖大师往西天取经，流与郡主大传。”这是后周时四川高僧往印度取经，途经敦煌，以此赠送郡主曹元忠的。《妙法莲华经序品》（P3023）卷末题云：“伏维大王采览”，下署“赐紫沙门继从呈上”。归义军节度使曹义金为沙州大王，此卷即僧人呈上以供览阅的。这些都是佛教僧侣因沙州都督府府主及官员信仰佛教，特为赠送的经卷。

（三）中国的中原王朝有的帝王特别提倡佛教，由朝廷组织中外经师翻译并抄录佛经。这些官本佛经是极宝贵的，曾以间接的行政方式流传于西北边陲。它们甚为沙州都督府所重视和珍藏。例如《大楼炭经》（P2413）末题：“大隋开皇九年（589）四月八日，皇后为法界众生敬造一切经，流通供养。”这是隋文帝皇后所造佛经，流传到了敦煌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一卷（P2323）是唐太宗时玄奘自西天取经回国后奉诏翻译的，末题：“贞观二十二年十月一日于雍州宜君县玉华宫弘法台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直中书长安杜行凯笔受，弘福寺沙门玄谟证梵语，大总持寺沙门辩机证文。”《妙法莲华经》（S5319）是唐高宗时期朝廷命虞昶监造的，卷三题记：

咸亨二年（671）五月廿二日书手程君度写，用麻纸十九

张。装潢经手王恭，详阅大德灵辩，详阅大德嘉尚，详阅大德玄则，详阅大德持世，详阅大德薄尘，详阅大德德逊，太原寺主慧立监，太原寺上座道成监，经生程度初校，大总持僧大道再校，大总持僧智安三校，判官少府监掌治署令向义威、行大中大夫少府少监兼检校将作少匠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

此次造经历时数年，每经俱详阅细校，而且由九卿监造，极为慎重。唐代武则天时由朝廷下诏监造了大量佛经，例如长寿二年（693）由武后之私侍白马寺大德薛怀义主持翻译和监造的《佛说宝雨经》（S2278），其组织规模是很庞大的，由中国和印度名僧数十人参加，分工细密，历时三年完成。这些都属于朝廷译造的官本佛经。因其具有一定行政受持，又因沙州佛教文化特盛，故它们为沙州都督府所收藏是不足为奇的。

从上述可知，沙州都督府文献中存在大量佛经，是因当时的地方行政长官及家属为争取佛教徒以推行地方政权而写造了大量佛经，当地寺院僧侣将所造的佛经送呈都督府官员以求得行政的支持，朝廷官本佛经以行政方式流传到边疆政府。沙州文化意识形态深受佛教影响，因而在都督府文献库里有专门的佛教经卷的庋藏，这是可以理解的。

三

在敦煌文书里佛教经卷所占的比例之大，似乎上述三种原因尚难以完满地解释。我们从敦煌经卷里不难发现：往往佛经的另一面或后面抄录了政府文书、民间契约、儒家经典、文学作品，等等。

当一件卷子两面抄写有不同性质的文献时，人们判断它们谁是正面或背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读者对内容的注意倾向。比如卷子的一面是佛经经文，一面是政府文书或民间契约，那么在

佛教徒看来必然佛经是正面，而在史学家看来则政府文书或契约是正面。因此，我们对敦煌文献著录者所定的卷子“正面”或“背面”，应作如是理解。

现在我们见到敦煌卷子所用纸张的制作年代自五世纪到十世纪末。晋代和六朝多用麻纸；隋唐时除麻纸外有椿皮纸和桑皮纸；五代时麻纸居多。六朝写本的纸质已洁白坚韧。北魏以来采用以黄蘗染纸的技术，可以防止虫蛀。唐人多用硬黄纸写经，此种纸是最高级的，其价值亦较昂贵^④。佛教僧侣和善男信女们造经是需一定用费的：必须购买质地很好的纸张，有的信徒因自己不能书写还得雇请书手。在敦煌经卷题记里，造经者自述节省日常用度以为功德，表示虔诚。《大般涅槃经》(S1317)是僧人道濬节省平日衣食之资而造的，其题记云：

保定四年(564)八月戊子朔廿五壬午，比丘道濬减省衣钵之余，敬写《涅槃经》一部。因此福上钟七世父母、六亲眷属，永离苦原，登陟妙境。

《华严经》(S1529)是信女袁敬姿节省日常生活用费而造的。其题记云：

开皇十七年(597)九月一日，清信优婆夷袁敬姿，谨减身口之费，敬造此经一部，永劫供养。愿从今以后，灾障殄灭，福受臻萃，国界永隆，万民安乐。

他们在造经过程中，购买优质纸张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在经卷题记里记下了所用纸张的数目，例如《妙法莲华经》(S1456)题记：

上元三年(676)五月十三日秘书省楷书孙玄爽写，用纸廿一张。装潢手解善集。

这些经卷的纸既是优质的，在西北边陲的价格因贩运而大大提高了。当地僧侣和信徒造经是出于圣洁的信念和虔诚的态度，他们宁可节省衣食，积攒资金，选择价高的硬黄纸，精心写造。他们绝不可能利用废纸或其他文书卷子来写佛经的，如果用废纸乃是

对佛祖菩萨的亵渎，亦是对自己信仰的践踏。因此，以上所列举的卷子一面为佛经，一面为其他文书，这种现象只能解释为，世俗因节约用纸经费而将废弃的佛经卷子用以抄录书籍或作为公文、契约的草稿纸使用。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判断，沙州都督府曾搜集敦煌地区寺庙废弃的经卷，作为其他种种用途，以节约购买纸张的经费。所以在敦煌文书里见到大量的双面抄写的卷子，此外还有许多废弃佛经以备作稿纸用的。这应是敦煌文书内存有许多佛经卷子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亦证实敦煌文书之为沙州都督府文献库之物了。

四

敦煌文书是谁藏的？关于此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

（一）佛教徒收藏：“公元十一世纪初占领于阗国的哈拉汗王朝，实行毁灭佛教政策。宋绍圣（1094—1097）中，他们向宋王朝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赞许。这一消息传到敦煌后，在佛教徒中引起恐慌，因而采取了封闭藏经的保护措施^⑤。”“佛教徒”这个概念在这里是较为含糊的。

（二）敦煌佛教寺院图书馆收藏：“敦煌佛经上面有一部分打着三界寺的藏书印记，说明在最后一段的时期，即张氏、曹氏统治时期，敦煌的佛教寺院以三界寺为最大。但敦煌所出的图书那样复杂，不像是一个佛教寺院图书馆所专有，所以有人推测是西夏的势力没有达到敦煌以前，有人（应该说是敦煌的都僧统）把若干寺院的藏经统统藏在第二八八洞内，并在前面筑起了复壁，就逃走了。”^⑥这大致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关于寺院图书馆，或准确地说说是藏经室，我们在敦煌经卷里发现有两个寺院收藏的最多，即三界寺和净土寺。

这只能说明敦煌经卷中很多是曾为三界寺和净土寺收藏的。如果认为敦煌文书以这两座寺院的藏经为主，或者它们是敦煌的河西都僧统将许多寺院的藏经集中起来而封藏的，这都不能解释为什么敦煌文书中存在政府公文、民间契约、儒家经典、史籍地志、户籍帐目和军事情报。它们是绝不可能为寺院收存的。

（三）寺院的废物：敦煌遗书很可能是废弃的经典，只是由于我国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及佛教对破旧佛典的敬畏心理，使这些东西不能随意丢弃。再加上当时北宋所雕《开宝藏》已经传入敦煌，而且敦煌本地的造纸业也发展起来，已不需要再用以前的废弃纸张的背面来书写，于是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便进行了一次寺院大清点。清点后遂将一大批残破无用的经卷、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与废纸，以及用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统统集中起来，封存到第十七窟中^①。这种推测是缺乏事实依据和经不住理性检验的。例如说，敦煌造纸业发展起来，不再需用废弃纸张背面书写了，但在敦煌卷子里 P2736 佛经的背面即有归义军敕令：“敕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七百户敦煌郡王曹。”曹元忠于宋代建隆三年（962）特进太师^②，这已是归义军后期了，仍然在用废弃佛经作文书草稿纸。如果兑宋代开宝（968—975）以后敦煌有了《大藏经》就无需过去的旧佛经了，但事实上《大藏经》与佛经写本是有不同社会作用的，它不可能代替一般信徒所需的经书；尤其是许多珍贵的古本佛经和精造的官本佛经皆属寺院佛教文物，绝不会因有了《大藏经》而将它们作为废纸处理。关于敦煌政府档案文书——“过时文书”，它们是不可能存在于寺院的，怎么会是寺院的废纸呢？我们暂且将敦煌文书视为寺院的“废物”，但关于它的处理是否要很神秘地封藏呢？如果说这是因敬惜字纸的传统而保存，则更与佛家信仰无关了。“惜字得福”是信仰道教文昌帝君的教义，在敦煌佛教胜地是无此种观念的。

（四）敦煌官府与各寺院的经典文书：“瓜沙上层统治者预感到战争即将临头，不得不做充分准备，便有条不紊地封藏各大寺院的经典、画卷，顺便把官府与寺院的一些社会文书等也收藏进去。从收藏的经卷与社会文书所涉及的范围来看，当是有计划的密藏，决非短期内仓促所为。”^①如果真是这样有计划、有条不紊地长期将该地区众多寺院（十六座以上）的佛经和政府文书等等全部收齐，这必然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小小的藏经洞无法容纳；二是由于兴师动众，而又长期进行，便不可能作到绝密。所以这种推测是难以成立的。

关于敦煌文书是谁藏的，现在我们仅能根据藏经洞秘存的情形进行推测。这诸种推测各有一定合理因素，但我以为将它视为沙州都督府文献似更为合理。

注：

①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②据《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有“毗赞司空”；又《春秋后国语》背记有“我司空兮叙沙漠，义气雄兮是天配”，司空指张义潮。参见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敦煌学文选》第45页，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1983年。

③据姜亮夫：《莫高窟年表》第1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④王进玉：《敦煌石窟探秘》第87—8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⑤殷晴：《敦煌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文物》1979年9期。

⑥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第290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⑦方广钊：《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5期。

⑧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见《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第803页，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1年。

⑨谭真：《从一份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敦煌研究》，1988年4期。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